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第三條路：新時代的新政治？

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New Times?

doi:10.29816/TARQSS.200012.0005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40), 2000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40), 2000

作者/Author：陳宜中(I-Chung Chen)

頁數/Page：153-17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0/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29816/TARQSS.200012.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四十期 2000年12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40, December 2000.

第三條路：新時代的新政治？*

陳宜中

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New Times?

by
I-chung Chen

關鍵詞：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福利國家、工作福利、工作倫理、福利依賴、社會投資

Keywords: the third way, social democracy, welfare state, workfare, work ethic, welfare dependency, social investment

* 作者感謝匿名評審們的批評和指正，以及孫善豪、錢永祥、林天河、呂建德、蔡孟翰等人給予的批評與建議。文中任何疏失或錯誤之處，當然仍由作者負責。本文原稿曾宣讀於由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所舉辦之「第二現代：個人化、全球化與風險社會」研討會（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特此感謝研討會主辦人顧忠華教授、研討會成員以及其他參與者的協助。

收稿日期：2000年5月22日；通過日期：2000年12月21日

Received: May 22, 2000; in revised form: December 21, 2000

通訊地址：北市南港區 115 中央研究院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email: ic10006@gate.sinica.edu.tw



摘 要

什麼是「第三條路」？本文檢討英美第三條路的幾項重要主張及其相關爭議，並提出一些反省和批評。過去二十多年間，歐洲各國福利體制無不面臨嚴峻的挑戰，而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步伐的加快，以及結構性失業、產業結構改變、勞動市場轉型、高齡化等問題之浮現，來自於內外的改革壓力更是有增無減。基於此一體認，各種改革的版本、策略或路線應運而生，而布萊爾和季登士所主張的「第三條路」不過是其中之一。英國第三條路論者對於傳統歐美福利國家體制做出了深刻的批判，但他們以「打擊福利依賴」、「培育工作倫理」、「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打造理想公民」為基調的整套說法與做法卻不無值得商榷之處。本文嘗試說明第三條路其實是一種與新右派十分接近的政治路線，而這種政治最令人詬病之處在於視而不見失業與貧窮問題的主因，轉而採取一種道德威權主義色彩強烈、以嚴厲的辭令與手腕對待弱勢者的統治方式。

Abstract

According to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goes beyond both 'old-style social democracy' and 'neo-liberalism', and as such it represents the political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So what is the third way? To what extent is the project true to the ideals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and American New Deal liberalism? This article takes the view that 'work' is central to third-way politics, and that understanding its attitudes towards work is a prerequisite of understanding much else that it does. The third-way welfare reform aims to promote work ethic through workfare programs, so as to 'end welfare as we knew it'.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se key ideas and their logic, and some of their practical consequences. It concludes that the Anglo-American third way is no more than a moderate version of Thatcherism, and represents a return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New Poor Law of 1834. The authoritarianism of third-way politics is subjected to critical scrutiny.



壹、前言

總統大選期間，陳水扁先生遠赴倫敦政經學院訪問，希望加入國際「第三條路」／「新中間路線」的行列；而現任政經學院院長安東尼·季登士（Anthony Giddens）亦表示他所提倡的第三條路不僅適用於歐美，對發展中國家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本文試以英美（尤其是英國）為例，評析第三條路的幾項重要主張及其相關爭議，並提出一些初步的反省和批評。

一八九〇年代，天主教教宗皮耶斯七世（Pope Pius XII）呼籲眾生找出一條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此後，各式各樣的第三條路不絕於耳，一九二〇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者、三〇年代的英國工黨、五〇年代的社會主義國際、七〇年代的德國綠色勢力、東歐的市場社會主義者和南歐的歐共主義者、八〇年代的瑞典社民黨……都曾經自詡為第三條路的領航人。¹

到了九〇年代中期，「第三條路」輾轉流傳到了美國的新民主黨陣營。科林頓自上任後大力推動美國醫療體系的改革，但卻很快地以失敗告終，而他的幕僚遂提出了向「第三條路」轉進之構想。基於近年來美國經濟的突出表現，科林頓也就很自然地成了國際「第三條路」的代言人。²

與此同時，以科林頓為師的布萊爾也加入了第三條路的行列，並向歐洲的兄弟政黨大力推銷這條新政治路線。在布萊爾和季登士等英國論者的手中，原本結構鬆散的第三條路論述升格成了「一套新的、整合性的政治觀點」，並被重新定位成「社會民主的更新」。它的訊息是：歐洲社會民主必須向科林頓學習。³

英國第三條路所欲挑戰的是戰後西歐福利國家體制及其背後的思

1. 關於歷史上的「第三條路」，參見 Giddens (1998, p.15) 和 Lukes (1998, p.3)。

2. 參見 Clinton et al. (1999)。

3. Giddens (1998, p.24)，另見 Blair (1998)。

考模式，並進而提出了一種以美國新民主黨為師的改革路線。根據筆者的歸納，此一改革路線至少包括了下列幾項核心主張。首先，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戰後福利國家體制有大幅變革之必要。傳統歐美福利國家的一大弊病在於助長了「福利依賴」(welfare dependency)，使得一群福利依賴者逐漸和主流社會脫節，不利於社會整合與經濟效率。因此，第三條路主張改採有附帶條件的「工作福利」(workfare; welfare to work)：唯有願意進入勞動市場工作或找工作的失業者才能領取所謂的福利，否則將自動喪失此一資格。職是，第三條路政治係以「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no rights without responsibilities)為指導原則，強調公民須盡一定的社會責任，而不能無條件地坐享所謂的「社會權」或「福利權」。這也意味著歐美老左派的社會正義思考有修正的必要，必須為一種以「勞動市場的參與」、「工作倫理的養成」、「個人責任的培育」為核心的社會正義觀所取代。第三條路的理想公民是一個勤奮工作、自給自足、獨立自主、不畏風險的人力資本家，而第三條路政府則必須致力成為一個積極的「社會投資」國家，積極投資於教育、訓練、技能提昇，以幫助每位公民成為她／他自己人力資本的最佳經紀人。第三條路兼顧財富創造與社會整合，促進「機會平等」而非「結果平等」，因此與有礙經濟發展、以社會安全和經濟重分配為己任的老左派路線有所不同。

在過去數年間，第三條路已發展成了一套非常龐雜的政治論述，而本文自然無法面面俱到，僅能針對上述等主題做進一步的分析。下一節中，筆者將先簡述歐洲社會民主人士關於福利國家改革的一些討論與看法，以助於釐清英美第三條路的特色；然後分別探討美國第三條路的兩大主張（「工作福利」與「社會投資」）及其所引發的爭議（第三節），以及英國第三條路的理論與實際（第四節）。

貳、社會民主的更新

按照季登士的說法，第三條路是超越了「老式的社會民主」（老左

派)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新右派)的一條新政治道路。「老式的社會民主」所指的最主要是二次大戰後西歐的社會民主改良主義,同時也暗指美國的新政自由主義(New Deal liberalism)政治傳統。此一擁護福利國家體制的政治路線自七〇年代末起接連遭遇到一系列的挫敗,換來的是雷根、布希、柴契爾、科爾等泛新右派人士的連年執政。依季氏之見,重新取得執政權的社會民主人士不能只顧著批判新右派(第二條路),還必須痛切反省老左派(第一條路)的種種弊病,如此也才能使社會民主浴火重生。⁴

季登士認為「老式的社會民主」具有下列幾項特質：國家普遍而且深入地介入社會和經濟生活；國家宰制公民社會；集體主義；凱因斯式的需求管理，外加統合主義；限制市場的作用；混合經濟或社會經濟；充分就業；強烈的平等主義；包攬一切的福利國家，為公民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保護；直線式的現代化道路；低度的生態意識；國際主義；屬於兩極對立（冷戰）的世界。⁵照季氏的陳述，此一老左派路線之所以自七〇年代中期起逐漸步入危機，其主因在於社經環境業已大幅轉變。例如：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業已逐漸崩解，直接地挑戰了「(男性)充分就業」之傳統主張；產業結構的改變使得「(男性)充分就業」所賴以維繫之大眾生產日趨式微；福利國家的官僚性格已經不得人心；而隨著布萊頓森林體制的瓦解、國際金融市場的解除管制以及全球時代的到來，昔日的「一國凱因斯主義」已窒礙難行。⁶

誠如季登士所說，「被大多數人看成是社會民主政治之核心的福利國家如今製造出的問題和它所解決的一樣多」。然而社會民主並不等於福利國家，因為「在許多國家，包括英國，左派和右派都為福利

4. Giddens (1998, pp.3-16)。

5. Giddens (1998, p.7)。

6. Giddens (1998, p.16)。



國家的創立做出了同樣多的貢獻」。⁷在新右派抬頭的八〇年代，的確有不少社會民主人士以福利國家的捍衛者自居而漠視了改革的必要，也有不少（如季登士本人）開始左傾，主張對資本主義體制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但隨著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瓦解、德國的統一、歐洲經濟整合架構的確立，上述等「老左派」的意見陸續被淘汰出局。到了九〇年代中期，福利國家的現代化已公認為是歐洲社會民主的一大政治要務。

促成此一改革共識的原因有許多，其一是歐洲經濟整合所帶來的經濟壓力，另則是舊福利體制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病。德國統一之後，歐洲經濟整合的大框架更清楚地浮現了出來；在此一經濟賽局的結構限制下，為公司企業減稅、調降其社會安全負擔、修正以往過分進步的所得稅制、縮小財政赤字、調增消費稅的稅率與稅目……等等已是大勢之所趨，而影響所至，社福體制也必須有相應的調整。⁸此外，隨著社經大環境的轉變，舊有的福利體制在許多方面明顯地違背了公平正義的原則，並製造出諸多所謂「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現象。例如在德法等國，勞動市場的中堅份子享受著社會安全體系的保障，而被排除在外的「局外人」（年輕失業者、移民、外勞、部分工時的工作者）則遭受不公平待遇；這種體制助長了社會分裂的趨勢，而其惡果之一即是法西斯主義團體的死灰復燃。⁹

雖然社會民主人士全都成了福利國家的改革者，不過在改革的取向上卻仍存在著許多重要的差異。其中，以科林頓為師的英國工黨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案例。以下筆者將提供一些非常粗淺的對照比較，以初步地釐清英國第三條路的幾項特色。

在拋棄了「(男性)充分就業」的迷思之後，促進「勞動市場的參

7. Giddens (1998, pp.16, 4)。

8. 關於歐洲經濟整合對福利國家體制的衝擊，參見 Hirst and Thompson (1999, ch.6) 和 Scharpf (1999)。

9. 參見 Esping-Andersen (1996b) 論德法福利體制的改革前景。

與率」成了歐洲社會民主政府的一項共同主張，但同一主張的背後卻有許多不同的考量，例如：因應即將到來的高齡社會、維持福利體制的寬裕和穩定、避免社會分裂、打擊福利依賴……等等。其中，以「打擊福利依賴」、「培育工作倫理」為主要訴求的英國第三條路可以說是一個奇特的案例。這套政治語言在英國有悠久的歷史，但至今仍難以見容於深受社會民主和基督教民主傳統所影響的北歐與歐陸各國，而辭令上的差異同時也反映在政策上的差異。¹⁰

提高勞動市場參與率最主要的工具之一是所謂「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而在實踐上，這意味著修改無條件發放失業救濟金的消極做法，轉以更積極的方式幫助失業者投入勞動市場。為達此目的，北歐與歐陸等國所施行的方案為參與者提供了更全面的醫療、托兒、教育、訓練、交通等服務以及更寬裕的經濟援助，其假設是失業者確實想要工作並且值得幫助。對英美第三條路政府來說，這種全方位的積極做法乃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愛之適足以害之，反而不利於工作倫理的養成。在下文中，我們將發現英美政府先入為主地斷定經濟弱勢者不想工作、缺乏工作倫理和責任心，並進而對他們進行道德上的批判。

即便是在重重的經濟限制下，政府也還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提高勞動市場的參與率。為了因應高生產力時代的到來以及「工作數量不足」的情況，法國社會黨政府已經把工時縮減為三十五小時。而英國第三條路政府則堅守四十八小時的底線，想要以低工資、低技術的工作促進勞動市場的參與。

過去，「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意味著政府必須扮演起創造公部門工作的終極雇主的角色。但近年來歐陸社會民主人士咸認為有必要向英美學習，以私部門服務業工作吸收就業人口，從而逐步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職是，如何避免低工資、低技術部門成為貧窮的溫床（例

10. 參見 Vandenbroucke (1999) 論英國第三條路的特殊性。此外，根據筆者的了解，德國總理施洛德的「新中間路線」並不包括「打擊福利依賴」、「培育工作倫理」這類的口號與主張。

如：補助低工資工作者、把部分工時工作者納入社會安全體系）遂成了改革的重點。在這些方面，荷蘭公認為是最成功的改革先例，而英國則經常被視為是負面教材。

相較於二十年前，荷蘭的貧窮率下降了一半（目前約百分之六），而這是在社福開支縮減的情況下達成的。¹¹英國的貧窮率約是荷蘭的三倍，正好構成一個鮮明的對照。不過對英國第三條路論者而言，貧窮率與貧富差距數字的本身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還得視社會流動率、家庭結構、個人生命歷程等其他因素而定。看重貧窮問題和所得差距被他們說成是老左派意識形態的作祟，而大多數社會民主人士卻還是不能認同這種（與新右派看來並無二致）的說法。

「社會投資」或「人力資本的投資」幾乎是所有社會民主人士（包括英美第三條路論者）共同一致的主張。它意味著政府必須致力提升人民的知識和技術水平以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尤其必須為弱勢者、中下階層子弟、低工資工作者進行教育和訓練的投資。「社會投資」是英美第三條路政府的一大政治口號，但直到目前為止卻還沒有什麼特別的作為。顯而易見，如果執政者認定失業者 and 弱勢者的問題在於工作倫理和責任心的缺乏，那麼大概也就不會有意願為他們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投資（無論口號有多響亮）。

以上只不過是一些非常粗淺的對比，其目的僅在於突顯英國第三條路的幾項特色，並藉此說明福利國家的改革和「社會民主的更新」其實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式，而第三條路充其量不過是其中的一種，也不見得就是最可欲的一種。綜合上述，筆者認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第三條路以「打擊福利依賴」、「培育工作倫理」為基調的整套說法和做法，另則是其對貧窮與貧富差距問題所採取的態度。英國工黨

11. 參見 Becker (2000) 論荷蘭的改革及其效果，另見 Hirst and Thompson (1999, ch. 6) 的相關討論。

之所以選擇了此一改革路線乃是受到了科林頓的影響所至。在接下來的兩節中，筆者將先後檢討第三條路在美國和英國的發展。

參、第三條路在美國

九六年間，科林頓政府通過了一項醞釀已久的「福利改革」法案，不但大幅削減單親媽媽的「福利」，並以取消福利為工作誘因迫使她們投入勞動市場。此一法案受到來自美國自由派人士的猛烈抨擊，而科林頓則辯稱他的靈感來自於瑞典所施行的「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不少美國的第三條路論者因此與科林頓分道揚鑣，認為他的做法不但稱不上是第三條路，也無法幫助單親媽媽們改善生活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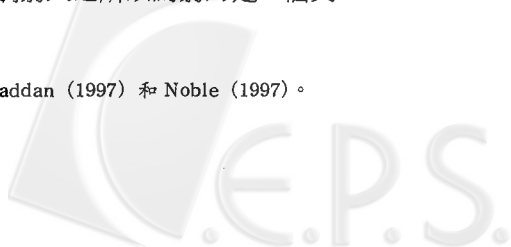
在美國的語境中，「福利」一字所指的最主要是那些針對性強、以現金支付為主的扶貧方案（而不包括所謂的「社會安全」和其他社會保險方案）。這類扶貧方案在六、七〇年代經歷了一系列的擴張，雖沒有根絕貧窮，卻似乎多少發揮了一點功效（貧窮線以下的人口從六〇年的 22.2% 降至七九年的 11.7%）。¹²此後，隨著雷根的上台，貧窮率又開始往上攀升，但新右派人士反倒成功地把問題歸罪於六、七〇年代「自由派」（Liberal）的福利政策。¹³在新右派的陣營中，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說法是沒有福利政策就是最好的福利政策：政府的福利開支為窮人提供了反工作誘因，製造出了一個難以自拔的底層階級（underclass），而最好的解藥就是撒手不管，完全交由市場、個人和家庭去謀求解決之道。¹⁴此一說法為大幅削減福利的雷根和布希政府提供了很好的藉口，但貧窮人口卻還是沒有隨著福利的削減而減少，遂使得另一種新右派的說法逐漸水漲船高。

另一種說法係以勞倫斯·米德（Lawrence Mead）為首的「依賴文化」（dependency culture）觀點，強調窮人之所以為窮乃是一個文

12. 此一數據取自 Waddan (1997, pp.104,134)。

13. 關於戰後美國福利政治的發展與逆轉，請見 Waddan (1997) 和 Noble (1997)。

14. 例如 Murray (1984)。



化問題，多半是「自願的」(voluntary)而不是由任何結構或經濟因素所造成的。工作倫理的喪失、責任感的缺乏、精神上的缺陷，是此一病態文化的最主要症狀，使得窮人寧可依賴福利也不願工作。依米德之見，老式福利政策的問題並不在於其開銷，而在於沒有要求福利依賴者去盡他們應盡的社會義務(工作)；他遂建議美國政府改採以工作為附帶條件的「工作福利」，好讓福利依賴者重拾工作倫理、脫離依賴文化。¹⁵

第三條路的指導原則是「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而米德即是這套思想與行動準則的導師。米德式的新右派思考成功地顛覆了六、七〇年代美國福利政策背後的權利哲學，而「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遂逐漸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正確。影響所至，科林頓政府於九六年終結了從新政時期所延續下來的 AFDC 方案，並以米德式的「工作福利」取而代之。¹⁶AFDC 的受惠者主要是家有幼兒的單親媽媽，其用意在於使她們得以選擇在家照顧幼兒而無斷糧之虞。

福利改革法案通過後，單親媽媽們不再享有「不勞而獲」的福利，而必須投入勞動市場以換得領取兩年福利金的權利，一生至多五年。¹⁷科林頓不但接受了米德所主張的政策，也同時接收了「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之類的口號。不勞而獲是不負責任的表現，而工作福利的用意則在於提倡「個人責任」與「工作倫理」。

福利改革法案通過後，不少自由派人士呼籲科林頓政府不要採取過分威權(米德式)的手段，而必須為參與工作福利方案的單親媽媽提供教育、訓練、托兒、交通、醫療等服務，並在必要時扮演起終極

-
15. Mead (1986 ; 1989)。參見呂朝賢／王德睦(2000, pp.167-172)論 Murray 和 Mead。另見 Roche (1992, ch.6) 對美國新右派福利思想的簡介，以及 Dean and Taylor-Gooby (1992) 對「依賴文化」一課題的相關討論。
16. AFDC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的歷史前身是新政時期的「保護母親」方案，參見 Skocpol (1992) 和 Beer (1998)。
17. 參見 Beer (1998)、Street (1998) 和 Waddan (1997, ch.7) 論此一「福利改革」的具體內容。

雇主的角色。按照科林頓政府九四年的一次估算，這種效法瑞典的全方位「社會投資」比起福利支出還要貴，而且每年至少貴了二十億美元，於是也就不了了之。¹⁸現實中的工作福利方案遂和米德的構想差不多，它或許沒有節省多少開支，但經費也沒有真的投注在教育與訓練上，而花在支付一種培養工作倫理的公民課程。參與工作福利方案的單親媽媽們被要求儘快找到工作以便從失業數字中消失，但還是沒有脫離貧窮的困境。她們在勞動市場的底層和其他人一起競爭低工資工作，在支付了交通費和托兒費之後，大多數人的淨收入仍在貧窮線以下，而且隨時可能再度失業。基於美國經濟近年來突出的表現，勞動市場尚能勉強吸收單親媽媽大軍，但許多論者認為工作福利方案恐怕經不起一次經濟衰退的考驗，是治標而絕非治本之道。¹⁹

在經濟成長、就業奇蹟、工作福利的背後，是居高不下的貧窮人口、貧富的懸殊差距和福利開支的一路削減。若按照政治經濟學家艾斯平·安德森 (G. Esping-Andersen) 的說法，這是個不斷向下看齊的惡性循環，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大舉從事「社會投資」(人力資本的投資)，想辦法提昇所謂「麥當勞式工作」(McJobs) 工作者的技術水平，好讓他們也有向上流動的一天。²⁰「社會投資」是第三條路的另一大政治口號，如果科林頓政府不願為單親媽媽們進行投資，在其他地方或許還應該有些作為。但按照前勞動部長勞伯·瑞奇 (Robert Reich) 的觀察，他的頂頭上司在社會投資方面的表現幾乎可以說是乏善可陳。事實上，「再訓練的開支不升反降，而且必定一路下滑。華盛頓也毫無意願在教育上做適當的長期投資。一九九六年，會計部門指出國家需要一千一百二十億以重修公立學校的建物……最後決定的數字

18. Reich (1999, p.49)。

19. 參見 Beer (1998)、McCrate and Smith (1997) 和 Street (1998) 論工作福利方案的效果。

20. Esping-Andersen (1996a, pp.8,17-18 ; 1996c, pp.258,262-265)。

是零」。無怪乎瑞奇認為科林頓早已「無可自拔地選擇了第二條路」。²¹

前勞動部長瑞奇公認為美國第三條路的理論大將，力主聯邦政府進行大規模的社會投資。根據他的說法，近年來美國勞動市場朝向「高技術」和「低工資」兩極分化的趨勢是可以避免的，而這有賴於政府大舉投資於教育、訓練、技能提昇，並設法誘導公司企業為員工提供在職訓練。²²依艾斯平·安德森之見，技能的提昇或許還是無法完全消滅後工業社會中的麥當勞式工作，而補救之道則在於提倡「活到老學到老」(lifelong learning) 的觀念：如果在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中，麥當勞式的低工資服務工作不過是階段性的或短暫的插曲，那也就無足為懼了。這意味著歐美福利國家應該轉型成一種從搖籃到墳墓全包的「社會投資國家」，為所有公民（尤其是低工資工作者）提供全方位的教育和訓練服務。²³

根據瑞奇的說法，英美第三條路包含了下列幾項基本主張：經濟全球化；解除市場管制；勞動市場的彈性化；削減福利開支；工作福利；削減財政赤字。他全盤接受這些主張，但強調其與第二條路（新右派／新自由主義）無甚差異，到目前為止只造福了高技術的「勝利者」而使得一大群低工資的「失敗者」愈陷愈深。「社會投資」是瑞奇所提供的解藥，其終極目標在於幫助低工資工作者轉型成知識經濟的中堅，從而促成產業結構乃至於勞動市場的升級。但社會投資比起以往的福利開支還要來得貴，並意味著「勝利者」必須納很多、更多的稅。瑞奇於是相信一種創造雙贏的新社會契約是有必要的：弱者給予強者自由（解除市場管制、彈性的勞動市場、更小更破的社會安全網），而強者則大舉投資於弱者的技能提昇。若非如此，瑞奇認為社會安全

21. Reich (1999, pp.49-51), Faux (1999, p.74)。

22. Reich (1991; 1999)。

23. Esping-Andersen (1994, pp.182-183; 1996c, pp.259-261,264)。參見 Piven (1994) 對此一觀點之批評。

網的重新建立將是有必要的，也將是避免社會分裂的唯一途徑。²⁴

過去數年間，「社會投資」這項主張在美國學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絕大多數論者同意人力資本的投資的確是值得努力的目標，並且有助於經濟的長期發展。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項投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能幫助低工資部門的從業者向上流動，從而抑制所得分配的惡化和勞動市場的極化趨勢，卻仍是爭論的一大焦點。瑞奇的批評者指出，供給面的政策如人力資本的投資必須仰賴需求面的配合和制度面的改革方能見效，否則供過於求的「高技術」人才照樣得屈就「低工資」的工作，而這對所得分配的改善未必有多大助益。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單靠投資人力資本以促成經濟平等幾乎是項不可能的任務，因其需要近乎天文數字的教育支出；如按照芝加哥經濟學家的一項估計，若想單靠教育以恢復到七九年的所得分佈，所需之經費將超過兩兆美元。²⁵這也是為何索羅（R. M. Solow）認為第三條路論者其實「是在和自己開玩笑」，因為他們的願景明顯地違背了「正常的經濟學」。²⁶易言之，如果第三條路論者如瑞奇真的想要促進經濟平等，那麼就必須體認到制度改革、經濟重分配、社會安全體系的重要性，而不應把「社會投資」的口號無限上綱，或甚至把它與社會安全、經濟重分配相對立。

這一節中，作者評述了美國第三條路的兩大主張：「工作福利」和「社會投資」。近年來美國的經濟奇蹟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過從美國各界關於第三條路的爭論中亦不難發現，伴隨著新經濟時代而來的經濟極化趨勢確實構成了一大隱憂。在科林頓的任內，「社會投資」的口號並未付諸實踐，而「工作福利」遂成了第三條路政府最重大的施政成果。

24. Reich (1999)。

25. 這類的批評非常多，參見 Howell (1994) 和 Kuttner (1999, pp.101-105)。

26. Solow (1998, p.27)。



肆、英國第三條路的理論與實際

九五、九六年間，在野的英國工黨把效法德國模式的念頭拋在腦後，而向科林頓的「第三條路」一路邁進。在工黨內部，諸如「社會投資」和「社會責任」之類的想法其實早在向第三條路轉進之前即已出現，因為向來重視教育和訓練的德國公認爲是「社會投資」的一個榜樣，而「社會責任」則多半意味著公司企業在支配其經營權的同時，還必須滿足一定的環保與社會標準，有責任把公司員工、消費者、社會大眾的利益一併納入考量。²⁷九六年後，公司企業的社會責任煙消雲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失業者、殘障人士、單親媽媽、退休老人的社會責任，而在社會投資方面表現平平的科林頓政府反倒成了「社會投資國家」的新表率。

就福利國家的改革而論，英國第三條路最重大的政績同樣也是一個「工作福利」方案。²⁸此一名之爲「新政」的方案象徵著工黨與昨日之我的決裂，可以說是了解英國第三條路最重要的指標。工作福利的適用對象原是所有依靠福利的失業年輕人（包括殘障者和單親媽媽），但後來亦逐漸擴充至二十五歲以上的失業人口，其經費來源則是前國營企業私有化後一次繳納的幸運稅。若與科林頓的福利改革法案相較，工黨的版本或可算是一種最起碼的「社會投資」，至少爲訓練不足的參加者提供了非常基本的訓練，並且以補貼的方式鼓勵私人部門提供就業機會。²⁹

此一工作福利方案咸認爲有兩項最主要的用意。其一是加速英國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使得被補貼的雇主有另一個廉價勞工的來源，而更重要的則是培育工作倫理、促進社會整合以及防治失業人口所造成

27. 與此相關的討論與辯論請見 Hutton (1995) 和 Kelly, Kelly and Gamble (1997)。

28. 關於工黨是如何走上了「工作福利」，參見 King and Wickham-Jones (1999)。

29. 關於此一方案的詳細內容，請見 Tonge (1999)。又 Powell (2000) 討論了工黨政府自九七 year 上台以後所採行的各項社會政策。

的社會失序問題。連大力支持新政方案的季登士亦不諱言：「用削減福利的方式迫使失業者去工作把他們推入一個本來就已經十分擁擠的低工資勞動市場」。³⁰英國第三條路政府正是利用此一「已經十分擁擠的低工資勞動市場」以達成培育工作倫理、促進社會整合的目的。

英國政府表明不會扮演終極雇主的角色，而完全交由低工資勞動市場去提供就業機會；雇主們也沒有責任為參加者提供任何訓練，用完了一批政府補貼的勞工還可以再換一批；而被解雇的、找不到穩定工作的人只好再接再勵，不然則必須回頭加入暫時性的社區服務或環境工作隊。許多英國學者指出，此方案為參加者所提供的訓練其實十分有限，只足以讓他們成為勉強還可以雇用的人；再者，不少獲得工作機會的參加者在很短的時間內又失了業，因為工作的數量並沒有增加。³¹如果六個月的臨時工也算是工作，那麼工作的數量的確大為增加；但換個角度來看，這只不過是把同一塊大餅（低工資勞動市場）切割成更多碎片的做法。

此舉或可使低工資勞動者更加倍努力去工作，使他們更不計較工作的環境，使他們更無法與雇主爭權益，但卻無法有效地改善他們的經濟處境。友好的批評者約翰·葛雷（John Gray）因此呼籲第三條路政府在要求失業者去工作的同時也盡一下創造工作的「責任」，因為他認為一次不必太嚴重的經濟衰退就足以摧毀這些人充當臨時工的機會，而使新政方案的立意全失。³²

葛雷的批評當然不無道理，但似乎並沒有抓住英國第三條路的精髓，因為新政方案的立意本就不在創造工作，而最主要在於培育「工作倫理」和促進「社會整合」（social inclusion/integration）。與柴契爾、梅傑政府所不同的是，工黨政府相信工作福利不但可以使勞動市場更為活絡，還可以藉由工作倫理的培育來緩和不少社會問題（如

30. Giddens (1998, p.110)。

31. 見 Grover and Stewart (1999)、Holden (1999) 和 Tonge (1999) 的相關討論。

32. Gray (1998)。



犯罪問題)。至於新政方案的參加者是否能在工作技能上大幅提昇、找到相對穩定的工作，其實並不是第三條路政府想要過問的。最重要的是讓他們或多或少有一些勞動市場經驗（名之為一種「工作『機會』的平等」），讓他們在不斷地工作和找工作的過程中找回所謂的工作倫理和責任感。諸如「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打擊福利依賴」、「把工作倫理放在福利國家的中央」、「促進工作『機會』的平等」等等遂成了英國第三條路政府的政治口號。³³

在美國，所謂的「福利依賴者」還不包括依賴社會安全體系的退休老人；但在英國第三條路論者的手中，退休老人卻也成了「福利依賴者」。一九九四年，世界銀行發表了一份極具影響力的報告，報告中指出人口的高齡化恐將成為國家財政的定時炸彈，因此建議各國政府採行智利和柴契爾式的年金改革（即私有化）。雖然世界銀行的報告讓歐美各國警覺到人口老化所可能造成的財政問題，但對此問題學界至今仍無定論，到目前為止也只有英國政府大力推動私有化的改革。³⁴拜柴契爾年金改革之賜，英國現有四分之一的老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此一數字遙遙領先了歐美各國，可算是項英國第一。儘管如此，布萊爾和季登士以打擊福利依賴、提倡個人責任為名，主張持續推動柴契爾式的年金改革（科林頓則反對這項做法）。³⁵按照季登士的說法，「退休」、「退休金」、「領退休金的人」乃是福利國家所發明出來的範疇。為了達成其充分就業的目標，福利國家利用「退休金」把「老人」排除在就業市場外，使其成為一群與社會隔離的福利依賴者；如今，政府應當幫助他們重新進入社會，讓他們同樣享有就業的機會。基於此，季氏論道：「老年不應該被看成是只享權利而不負責任的時光」。³⁶

33. 參見 Blair (1998)。關於工作倫理的灌輸，另見 Lund (1999)、Jordan (1998, ch.2) 和 Holden (1999) 的相關討論。

34. 參見 Pierson (1998, pp.789-791)。

35. 關於布萊爾政府的年金改革，參見 Walker (1999)。

36. Giddens (1994, pp.170-171, 183-184; 1998, p.121)。

第三條路福利改革的美意在於促進社會整合，把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的個人和群體（尤其是失業者、殘障人士、單親媽媽、退休老人）重新納入主流社會（勞動市場），讓他們成為對自己和對社會負責的理想公民。若按照季登士的說法，「社會排除」所指的是「把某些群體排除在社會主流之外的機制」；許多上層精英選擇了自我排除，因而構成了「對公共空間或社會團結的威脅」（如美國和英國）；而福利依賴則是另一種型態的社會排除，必須得靠像新方案這樣的做法把福利依賴者重新納入社會。³⁷化解社會排除、促進社會整合、公民責任心的養成無疑是非常值得努力的目標，不過若就英國政府的實際作為而論，責任和責難很顯然是一面倒地落在失業者和經濟弱勢者的身上。

如果英國第三條路論者對於失業和貧窮問題的看法是正確的，那麼批評者也就沒有理由一味地反對。於是，我們或許有必要進一步探究第三條路的理論基礎及其種種假設。假設之一，工作其實不虞匱乏，工作意願的缺乏和政府的不當干預才是造成失業和貧窮問題的主因。工作倫理的缺乏和性格上的弱點是失業者之所以失業的最主要原因；造成此一文化現象的因素有許多，而政府不當的福利政策正是其中之一。消極地發放救濟金製造出了許多貧窮陷阱，妨礙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並助長了貧窮文化、依賴文化等現象；而一旦窮人和福利依賴者因此喪失了工作的動機或意願，那麼再多的工作供給也無濟於事。職是，政府必須以培育工作倫理、打擊福利依賴為己任，同時必須避免干預勞動市場的自由運作；自由市場當能夠有效地吸納失業者和福利依賴者，而貧窮問題的重要性也將隨著貧窮文化的不復存在而大為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這套近年來在英美大行其道的說法和做法其實並不是新右派論者的發明，而毋寧是十九世紀中葉英國自由主義思想的主流。當時，經濟自由主義者把失業和貧窮看成是一種文化或「性格」

37. Giddens (1998, pp.104-105, 65)。



(character) 上的問題，而不是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所造成的。由於失業者 and 窮人在性格上的缺陷，他們不是獨立自主的個人，而國家也因此必須採取必要的措施（如教育、培育工作倫理、取消無條件的失業救濟等等）改造他們的性格以協助市場機制的穩健運行。在一八三四年的新貧法案通過以前，失業的窮人可以領取微薄的公共救濟，一種公共慈善（public charity）式的救濟；此後，要求濟助的窮人「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必須進入「工作屋」（workhouse）養成工作的習性，並失去其公民權利。於是，不願意接受此一待遇的男人必須更加賣力地工作，成為不得不依附於勞動市場的勞動力，而勞動市場也因此更具有彈性。³⁸這套做法頗為成功地促成了朝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不過伴隨著此一過程而來的卻是大量的貧窮人口（無論其失業與否）和無產階級的興起。事實上，社會民主運動之所以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逐漸壯大，正是因為新貧法案背後的那套思想似乎看不見弱勢者的真實處境。

一百多年後，在所謂「新經濟」、「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時代中，一個勤奮工作、想要自給自足的低工資勞動者可能還是避免不了貧窮的困境；至為明顯，工作倫理未必足以改善他們的處境，而問題的關鍵也不在於他們性格上的缺陷。在社會科學的文獻中，科技的進步、生產力的提升、經濟的全球化、女性勞動力的解放、國家的總體經濟政策等等，經常被列舉為造成今日西方國家「工作數量不足」的幾項重要原因。在歐陸，「工作數量不足」直接地反映在失業數字上；在英美，同樣的問題則反映在一個龐大的低工資勞動市場以及貧窮數字上。若按照季登士在九四年《超越左右》一書中的說法，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是造成工作數量不足的主因，並使得「充分就業」逐漸失去了意義。³⁹把一個工作拆成三個固然可以使「失業」數字降低，其

38. 參見 Polanyi (1944) 論這段歷史過程，另見 King (1999) 論新貧法案及其背後的思想模式。

39. Giddens (1994, ch.7)。另見 Beck (1997) 對「工作數量不足」的討論。

後果卻是瑞奇所謂勞動市場朝向高技術（勝利者）與低工資（失敗者）兩極分化的趨勢。對低工資的一方而言，「工作倫理」在市場中所能兌換到的收入和自尊可以說是每下愈況。⁴⁰

如果主政者無視上述等現象，反而先入為主地斷定經濟弱勢者缺乏工作倫理和責任心，那麼所謂的工作福利也就很有可能淪為一種廉價的訓育課程。誠如經濟學家索羅所言，如果政府真的想要以勞動市場作為社會整合的工具，那就必須採行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並負責保證有效工作的有效供給；而在政府無法或無願這麼做的情況下，藉由低工資勞動市場以促成社會整合其實「是在和自己開玩笑」，一個空洞的政治口號而已。⁴¹

第三條路的批評者認為新政方案把福利依賴者變成了低工資臨時工的依賴者，但卻無法有效地改善他們的經濟處境。對此，許多英國第三條路論者的回答是他們所提倡的是「機會平等」而非「結果平等」，是工作機會的重分配而非所得的重分配。⁴²在一個高度流動的市場社會中，貧窮率與貧富差距等數字並不能客觀地反映出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和他／她的處境。例如貧窮線以下的低工資工作很可能是一個年輕人或外來移民的第一份工作；又如在今日「鐵飯碗」式工作已經愈來愈少的情況下，進出貧窮、進出就業市場變成是一種愈來愈普遍的

40. 即因如此，許多歐洲學者如 Ulrich Beck (1997) 和九四年的季登士 (1994, ch.7) 認為促進勞動市場的參與並不是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在工作數量不足的高生產力社會中，工作倫理以及以勞動市場的參與為核心的社會組織原則已經愈來愈不合時宜，而真正基進的出路則在於提倡工作倫理以外的種種生活價值 (九四年的季登士) 和勞動市場以外的種種社會參與形式 (Beck)。這意味著工時的進一步縮減；勞動市場的參與不再是公民取得收入的唯一途徑；破除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思想所杜撰出的「獨立自主的 (男性) 工作者」之迷思；重新肯定照顧活動的社會價值以促成兩性與家庭關係的民主化；提倡工作以外的種種社會活動，讓勞動市場的參與不再是自我實現的唯一方式和個人自主性的唯一判準。諸如此類的想法事實上已經非常普遍，並且已被翻譯成具體的政策主張，至於是否 (或在何種程度上) 真能實現則還是個未知數。

41. Solow (1998, p.27)。

42. 參見 Blair (1998)。



社會風險；又如伴侶的分合也很可能是使人暫時掉入或脫離貧窮的原因。對第三條路論者而言，諸如此類的例子說明了貧窮率和所得差距等統計數字的問題性格，因為這些數字並不能充分反映社會的實況。

季登士不能完全同意布萊爾政府的機會平等觀，理由是第一代的機會平等造成了第二代的起跑點不平等，也因此有違機會平等所隱含的公平競爭原則。⁴³儘管如此，季登士嘗試從另一個角度為今日英美懸殊的貧富差距進行辯護。首先，他援引某些關於社會流動和個人生命歷程的研究以貶抑貧窮率和貧富差距等數字的社會意義。⁴⁴此外，他認為經濟重分配在政治上已不可行，因為他相信（英國）中產階級的抗稅情結已經根深柢固。⁴⁵他並援引某些研究以指出歐洲福利國家的重分配效果其實十分有限，造福了中產階級卻不一定杜絕了貧窮，對所得分配的改善也未必有太大的助益。⁴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援引的研究都頗具爭議性，而反面的見解亦所在多有，至今仍無定論可言。季登士之所以選擇上述論點而排斥其他，乃是因為他認為社會民主人士應該放棄「經濟重分配」之老左派教條，而必須把「不平等」重新詮釋為「社會排除」。⁴⁷對季氏而言，這意味著貧窮文化和福利依賴，而非貧窮和貧富差距，才是主政者（第三條路政府）必須矯治的不平等現象。⁴⁸

筆者在第二節中指出為公司企業減稅和修改所得稅制已是歐洲各國在經濟競爭的壓力下所走的大方向，但也同時以荷蘭為例，說明英國第三條路對貧窮和貧富差距所採取的態度算是歐洲社會民主陣營中

43. Giddens (1998, pp.101-102)。

44. Giddens (1999, p.26; 2000)。 45. Giddens (1994, pp.141, 153)。

46. Giddens (1994, pp.149, 156-157, 173, 196-197)。

47. Giddens (1998, pp.102-105)。

48. 參見 Giddens (1994, ch.5 & ch.6) 論貧窮文化與福利依賴。季登士對於「福利依賴」的本質似乎並沒有定見，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說法。他深受 Murray (1984; 1988; 1990) 的影響，但也援引 Wilson (1987) 的觀點。關於 Wilson 的理論，參見呂朝賢／王德睦 (2000, pp.173-179)。Mead (1986) 的說法雖不受季登士青睞，但「依賴文化」的觀點卻也同樣出現在他的著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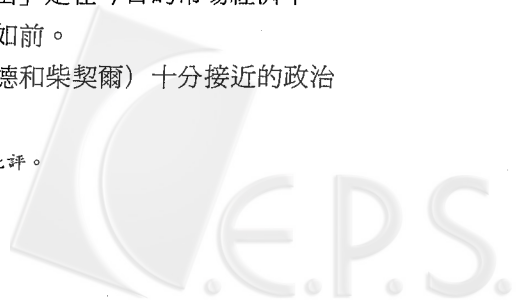
的一個特例。在重重的經濟限制下，要以更進步的所得稅制遂行經濟重分配的方式已不可取，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因此束手無策，而只能任由貧窮人口持續增加和貧富差距繼續惡化。顯而易見，問題的一大關鍵在於主政者是否認為打擊貧窮和促進經濟平等仍是重要的目標。此一立場上的差異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政策上的差異，例如對年金改革、對部分工時工作者是否應納入社會安全體系等問題的不同看法和政策主張。如果主政者認定四分之一的老人貧窮率沒有什麼意義，那麼更多的貧窮老人幾乎是可以預期的。如果政府相信低工資勞動市場只不過是一個人向上流動的跳板，而不可能成為貧窮的溫床，那麼大概也就不會採取積極的矯正措施。

綜合上述，我們到底該如何解讀英國的第三條路政治？布萊爾的第三條路政府以打擊福利依賴、培育工作倫理、促進社會整合為名，要求所謂的福利依賴者進入低工資勞動市場履行其社會責任，另則把退休老人也說成是福利依賴者以正當化其年金改革。所謂的工作福利方案，與其說是向「社會投資國家」邁進的第一步，倒不如說是一套打造理想公民的訓育課程，其目的在於改變福利依賴者的性格，讓他們成為在低工資勞動市場中努力打拚的好公民。

由於工作倫理和責任心的缺乏被視為是問題的關鍵，政府也就理直氣壯地扮演起了道德家的角色，不但積極地宣導「正確」的生活方式，還用「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這類的字眼對被點名的福利依賴者進行道德上的批判。⁴⁹基於同樣的道理，第三條路政府自認為既無必要創造工作也無責任為弱勢者進行更全面的社會投資，因為這些更積極的做法反而不利於工作倫理的培育。至於弱勢者的經濟處境則似乎不是第三條路政府所關切的焦點，其「理由」是在今日的市場經濟中，貧窮和貧富差距等問題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

這是一種與新右派（如勞倫斯·米德和柴契爾）十分接近的政治

49. 參見 Ross (1999) 和 Dahrendorf (1999) 的批評。



路線，而這種政治最令人詬病之處在於視而不見失業與貧窮問題的主因，轉而採取一種道德主義色彩強烈、以嚴厲的辭令與手腕對待弱勢者的統治方式。許多新右派的批評者認為這是種「責難窮人」的威權政治，並以「威權民粹主義」或「民粹威權主義」稱之。英國第三條路雖還不致於走到這種地步，但在許多說法和做法上卻與柴契爾主義一脈相傳，僅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別而已。這也是為何〈經濟學人〉雜誌把第三條路界定成一種較為溫和的柴契爾主義，一種所謂的「社會柴契爾主義」(social Thatcherism)。

伍、結語

過去二十多年間，歐洲各國的福利體制無不面臨嚴峻的挑戰，而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步伐的加快，以及結構性失業、產業結構改變、勞動市場轉型、高齡化等問題之浮現，來自於內外的改革壓力更是有增無減。基於此一體認，各種改革的版本、策略或路線應運而生，而布萊爾和季登士所主張的「第三條路」不過是其中之一。

在本文中，筆者試圖說明「第三條路」所代表的其實是一套頗為狹隘的政治觀點，也不見得就是全球化時代唯一可能、可行的政治出路。英國第三條路論者對於傳統歐美福利國家體制做出了深刻的批判，但他們以「打擊福利依賴」、「培育工作倫理」、「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打造理想公民」為基調的整套說法與做法卻不無值得商榷之處。如果本文的分析是正確的話，那麼我們很有理由相信第三條路既不是帶來希望與快樂的新政治，恐怕也難以稱得上是「社會民主的更新」。

達倫朵夫 (Ralf Dahrendorf) 論道，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整合至少可以有「一〇一種方式」，也就是說無窮多種方式，而英國第三條路不過是其中之一種，而且恐怕是不太可欲的一種。⁵⁰這也是本文的結論。

50. Dahrendorf (1999, p.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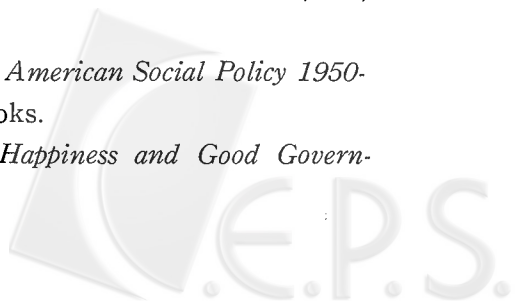
參考書目

- 呂朝賢／王德睦，2000，〈1960s 以降的美國貧窮理論：回顧與整合〉，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2(1)，頁 149-195，台北：中央研究
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Beck, U., 1997, 'Capitalism without Work', *Dissent*, 44(1), pp. 51-56.
- Becker, U., 2000,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in the Netherland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0(3), pp. 219-239.
- Beer, S. H., 1998, 'Welfare Reform: Revolution or Retrenchment?', *Publius*, 28(3), pp. 9-15.
- Blair, T., 1998, *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London: Fourth Estate.
- Clinton, B. et al., 1999, 'The Third Way: Progressive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DC, <http://www.dlcppi.org/conferences/thirdway/transcript.htm>.
- Dahrendorf, R., 1999, 'Whatever Happened to Liberty?', *New Statesman*, 6 Sep., pp. 25-27.
- Dean, H. and P. Taylor-Gooby, 1992, *Dependency Culture*,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Esping-Andersen, G., 1994, 'Equality and Work in the Post-Industrial Life Cycle', in D. Miliband, ed., *Reinventing the Left*, Cambridge: Polity, pp. 167-185.
- Esping-Andersen, G., 1996a, 'After the Golden Age? Welfare State Dilemmas in a Global Economy', in Esping-

- Andersen ed.,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London: Sage, pp.1-31.
- Esping-Andersen, G., 1996b, 'Welfare States without Work', in Esping-Andersen, ed.,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London: Sage, pp. 66-87.
- Esping-Andersen, G.,1996c, 'Positive-Sum Solutions in a World of Trade-Offs?', in Esping-Andersen, ed.,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London: Sage, pp. 256-267.
- Faux, J., 1999, 'Lost on the Third Way', *Dissent*, 46(2), pp. 67-76.
- Giddens, A., 1994, *Beyond Left and Right*, Cambridge: Polity.
- Giddens, A.,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 Giddens, A., 1999, 'Why the Old Left is Wrong on Equality', *New Statesman*, 25 Oct., pp.25-27.
- Giddens, A., 2000,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Inequality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10th ESRC Annual Lecture, <http://www.esrc.ac.uk/esrclecture10/full.html>.
- Gray, J., 1998, 'A Strained Birth of Liberal Britain', *New Statesman*, 21 Aug., pp. 28-29.
- Grover, C. and J. Stewart, 1999, 'Market Workfare: Social Security, Social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8(1), pp. 73-96.
- Hirst, P. and G. Thompson, 1999,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 Holden, C., 1999, 'Globalization, Social Exclusion and Labour's New Work Ethics', *Critical Social Policy*, 19(4), pp. 529-538.
- Howell, D., 1994, 'The Skills Myth', *American Prospect*, 18, pp.

81-90.

- Hutton, W., 1995, *The State We're In*, London: Cape.
- Jordan, B., 1998, *The New Politics of Welfare*, London: Sage.
- Kelly, G., Kelly, D. and A. Gamble, 1997, eds., *Stakeholder Capitalism*, London: Macmillan.
- King, D., 1999, *In the Name of Liberalism: Illiberal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 King, D. and M. Wickham-Jones, 1999, 'From Clinton to Blair: The Democratic (Party) Origins of Welfare to Work',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70(1), pp. 62-74. Kuttner, R., 1999, *Everything For Sal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 2nd ed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 Lukes, S., 1998, 'Left Down the Middl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5 Sep., pp. 3-4. Lund, B., 1999, 'Obligations, New Labour and Welfare Reform', *Critical Social Policy*, 19(4), pp. 447-462.
- McCrate, E. and J. Smith, 1998, 'When Work Doesn't Work: The Failure of Current Welfare Reform', *Gender & Society*, 12(1), pp. 61-80.
- Mead, L., 1986, *Beyond Entitlement: The Social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New York: Free Press.
- Mead, L., 1989, 'The Logic of Workfar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01, pp. 156-169.
- Murray, C., 1984, *Losing Grounds: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 Murray, C., 1988,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Good Govern-*



- men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Murray, C., 1990, *The Emerging British Underclas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Noble, C., 1997, *Welfare As We Knew It: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 Pierson, C., 1998,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o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Political Studies*, XLVI, pp. 777-794.
- Piven, F. F., 1994, 'Comment: Economic Imperatives and Social Reform', in D. Miliband, ed., *Reinventing the Left*, Cambridge: Polity, pp. 186-191.
- 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 Powell, M., 2000, 'New Labour and the Third Way in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0(1), pp. 39-60.
- Reich, R. B., 1991, *The Work of Nations*,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 Reich, R. B., 1999, 'We Are All Third Wayers Now', *The American Prospect*, 43, pp. 46-51.
- Roche, M., 1992, *Rethinking Citizenship*, Cambridge: Polity.
- Ross, N., 1999, 'Inventiveness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28(3), pp. 467-493.
- Scharpf, F. W., 1999, *Governing in Europe: Effective and Democratic?*,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 Skocpol, T., 1992,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 Solow, R. M., 1998, 'Guess Who Pays for Workfar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 Nov., p. 27.

- Street, P., 1998, 'The Poverty of Workfare', *Dissent*, 45(4), pp. 53-59.
- Tonge, J., 1999, 'New Packaging, Old Deal?', *Critical Social Policy*, 19(2), pp. 217-232.
- Vandenbroucke, F., 1999,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Convergence, Divisions, and Shared Questions', in A. Gamble and T. Wright, eds., *The New Social Democracy*, Oxford: Blackwell, pp. 37-52.
- Waddan, A., 1997, *The Politics of Social Welfar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Walker, A., 1999, 'The Third Way for Pensions', *Critical Social Policy*, 19(4), pp. 511-527.
- Wilson, W. 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Chicago: Chicago Univ. Press.

